

克洛岱尔和中国文化

[法]伊万·达尼埃尔 著

程文译

克洛岱尔是为数不多的在中国逗留了很长时间的几位法国作家中的一位。他1895年到中国时27岁,到他1909年完成使命离开中国时已41岁。外交官的职业把他首先带到了中国南方的福州,一个他特别钟情的城市,然后带到了汉口,最后从1906年起把他带到了中国北方的北京和天津。虽然克洛岱尔把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他的职业活动,但他从未停止过写作。他亲眼见到的中国文明在他心中激起了一种强烈的兴趣,并且很快,他决定从浩繁的中国文献中发掘中国文化精神,让他能真正理解这个他生活于其中、并每日都有发现的世界。

克洛岱尔1895年到中国的时候,正是汉学又重新兴起、并在中国本土产生了飞跃的时期。这种发展尤其要归功于一些传教士组织,不管这些组织是新教的还是天主教的。在香港,受人尊敬的理雅各把中国古典典籍翻译成英文,并于1858年起在《中国经典》丛书中出版;在河间府(今河北盐县),耶稣会士顾塞芬(Seraphin Couvreur)和戴遂良(Leon Wieger)致力于《经书》(Classiques)的法文翻译,译作的出版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汉学丛刊》从1892年开始出版,其理想是与十八世纪著名的《中华帝国志》相连续,这些著作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被现代汉学批评和修正,却是克洛岱尔逗留中国时最新发布和最容易找到的,自然也就是克洛岱尔一到中国便开始进行的他称之为“中国研究”^①所要关注的书籍。

^① 《瞬时的记忆》,巴黎,伽里玛出版社,《观念》丛书,1969年,第177页。

克洛岱尔关于中国的著作包括一些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作品,比如《认识东方》、《第七日的休息》、《正午的分界》和《诗艺》等。在这些作品中,以及在以后的一些作品中,我们都能发现一些他逗留中国的痕迹,发现一些中国书籍对他的影响和中国文化在他的头脑中激发起的思考。在他的作品中,中国从来不是作为一个应时的背景出现的,这种背景只是为了创造一种时常为西方读者所欣赏的“异域”氛围;相反,中国文化似乎深刻而持久地激发着克洛岱尔的思考和创作。

克洛岱尔:《老子》的阅读者

克洛岱尔首先对老子的《道德经》感兴趣。《认识东方》中作于1898年的诗作《运河上的休憩》^①包含着参考这位中国哲学家的明显之处。但他对《道德经》的阅读要比这一年份还早一些,证据就是完成于1896年的《第七日的休息》^②中对道家的“空”的观念的暗示。因此,谢阁兰在1909年与克洛岱尔第一次晤面后,不无见地地写道:“……和我一样,他(克洛岱尔)在中国一下就奔向了《道德经》这个老子的思想深潭……他只能借助于一个模糊的译本来思考它”^③。好在这个译本并不是作者到中国后所能拥有的几个译本中最糟糕的一个:这是理雅各于1891年出版于《中国经典》丛书第39卷的译本。^④借助这个英文译本,克洛岱尔发现了老子的思想并大胆地尝试转译《道德经》的一些章节。

《重新发现的诗》中的作品《道德经》^⑤,以前人们错误地把它当作克洛岱尔写的一首诗,实际上它来自理雅各译的《道德经》第

^① 《诗作》,巴黎,伽里玛出版社,《七星诗社》丛书,1967年,第76页。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中提到的克洛岱尔的作品均选自这个丛书出版的作品全集。

^② 这个剧本于1901年在《树》中第一次发表。

^③ 谢阁兰《中国书简》,巴黎,普龙出版社,《10/18》丛书,1967年,第63页。

^④ 《道德经》,理雅各翻译并注释,牛津克拉伦多出版社,《中国经典》丛书,第39卷,1891年。

^⑤ 《诗作》,第963页,克洛岱尔借用了理雅各“Tao teh king”中“teh”的拼写。